

对话

美国肯恩大学终身教授孔旭荣:

文科教师与跨学科思维、科技培训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去年春天,孔旭荣的学生作了一项问卷调查,参与调研的有一百多个学生认为,除了美食之外,中国文化对美国没什么影响。一百多个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不足以代表全美,但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在美国的边缘状况。

为了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近年来,孔旭荣先后在肯恩大学成立了中文研究、亚洲研究两个学科项目,致力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其中涉及文学、政治、历史、音乐、科技、商业的学科交叉。带着对海外文科建设、跨学科建设,以及如何实现大学与教师的共赢等疑惑,《中国科学报》记者与她展开了对话。

文科不能被高校放弃

《中国科学报》:如何看待文科走向衰败? 孔旭荣:一些机构要在满足大众温饱之前,做一些有建设性的、有前瞻性的事。近些年,全球经济经受挑战,网络、媒体、经济、社会都将教育导向实用型的学科。但是决策层必须清楚文科的价值和意义,有些课程是不能放弃的,即使全社会都放弃了,高校都应该坚持。教师是触摸未来的人,整个高等教育要有触摸未来的眼光。

《中国科学报》:文科教师自身应该去作何改变? 孔旭荣:在我看来,文科教师应该接受更多跨学科和科技的训练。

从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发现文学很自然地与其他学科交叉在一起,诸如绘画、音乐、动物、植物、地理、天文、水利、经济、管理等学科。可以说,跨学科是文学本身的一个现象。所以我现在的研究项目就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学创作,详细考量外来动物、植物、器物的演变和文化化。在课堂上,我也尽量用更广阔的视角引领学生。在讲中国文化史的时候,会穿插当时世界的文化发展状况,并反复强调一点——没有孤立发展的文化。

“中国古典文学”有一段时间上课的人越来越少,后来,我将课程改成“多媒体中的中国文学”,第一节课不再讲《诗经》《楚辞》,而是从迪士尼的木兰讲起,从动画片和诗歌《木兰辞》的比较入手,慢慢带学生体会文学的魅力。多媒体的使用在于通过对比使学生看到文学的特殊性质,并引起学生对文学的尊重,渐渐培养他们对文学的欣赏和爱好。

自说自话、敝帚自珍,都不会帮助文科枯竭

“我们面对的是跟网络成长起来的的学生,不会用他们熟悉的方式教学,那教学在开始之前已经失败了。”



逢春,如何让他他人欣赏得了你所欣赏的,是文科教师和学者面临的挑战,相信跨学科思维和科技资讯能给我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并找到出路。

跨学科生态如何营造

《中国科学报》:亚洲研究中心当时的建设思路是什么? 孔旭荣:它是作为一个学术项目于2011年建立的,目的是在不动用额外资源的情况下,利用现有的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给学生一个选择,让他们在交叉课程的学习中获得一个跨学科的本科学位。

在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中有一个令人捧腹的情节。教授在课堂上让学生给“机械”下一个定义。班上最聪明的学生给出了一个简洁的答案——任何能够简化工作或者节省时间的事物都是机械,而另外一个死啃书本的学生则一字不落地背出了书上冗长的一段定义。虽是影视剧情的虚构,但仍然折射出教条式教学的荒谬。何为“创新”?或许一切能够让人类的生活变得简便和舒适的构思及实践,都可以称之为创新。大学生们关注的科技创新,其实就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并最终在生活的土壤里开出的花朵。但是,缺乏专业基础和其他能力素质的支撑,盲目投身其中,显然是不可取的。

《中国科学报》:在这个过程中,最棘手之处是什么? 孔旭荣:亚洲研究中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系所,刚开始有一些教师由于观念未转变,认为

中心的存在过于抽象而拒绝加入。除此之外的难题是如何保障生源,到目前为止,我们有本科生20人,辅修生20人。40人,是学校、老师、学生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才达到的数字,虽然离我们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在美国经济衰退时期,作为一门美国人眼中的“小学”,这已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

《中国科学报》:您是怎么说服教师们加入的? 孔旭荣:教师们虽然分布在各个系,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教学和研究都与亚洲有关,这一共同点让教师们走在一起,并在不计较报酬的情况下支持项目的发展。他们继续开设原有的课程,定期参加项目会议,为项目发展出力献策。另外,随着项目学生人数增多,选他们课的人数增多,自然对他们也是有益的。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惑——由于实用学科的抬头,文科继续边缘化,再加上网络教学的冲击,文科教育将何去何从?如何枯

记者快评

「尊严」问题? 「面子」问题!

■陈彬

前段时间,一篇题为《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节操值多少钱》的文章在网络上走红,该文批评上述四所中国顶尖大学接受了美籍华裔廖凯原的捐款后,不仅以其名字命名受其捐资的建筑,还聘请其为名誉校董,成立“廖凯原研究中心”,为他开设了与轩轾黄帝等有关、带有明显玄学特征的选修课等。有网友认为,大学不应为吸引捐款而接受捐助

大学应该维护怎样的尊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2011年,清华第四教学楼被命名为“真维斯楼”。由于“真维斯”是一个休闲服装品牌,大家纷纷质疑清华的“商业气氛”太浓了。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曾经,五粮液集团提出愿拿出5000万元在清华捐建一座“五粮液体育馆”,后这一要求被清华大学拒绝。由于没有经费,这座体育馆的建设计划没有实现。

如今,“真维斯楼”的铭牌依然挂在第四教学楼的门外。学生们在此进进出出,很多学生都曾在这座充满了“商业氛围”的楼中彻夜苦读,相信他们今后的成功也少不了对“真维斯楼”的记忆。而反观那座没有建成的“五粮液体育馆”,如今已经没有人提及。只是当学生们感觉到没有地方健身时,也许心里会想:再多一座体育馆该有多好。

此时,谁会关注这座体育馆叫什么名字呢?回到“尊严”的话题。这就如同一个自然人一样,当接受另一个人的馈赠时,常常会接受一定的条件,如果条件过分,我们可以选择拒绝,反之则可以欣然接受,这是天经地义的,与所谓“尊严”之类毫无关系。而四所名校在接受捐款之后,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自身的科研教学压力,最终受益的是广大学生。此时,以谁的名字命名建筑,甚至于开设一些或许不太“靠谱”的课程,与这笔资金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相比,“性价比”如何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说到底,所谓的“尊严”问题,更多地可以被理解为“面子”问题。当大学还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时,“面子”是很重要的,而如今,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我们的高校开始抛掉“面子”,努力接纳更多的社会资源时,“面子”问题却依然在公众中广泛存在,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很让人无奈的事情。

心在云间 脚在地下

——从小竞赛谈大学生科技创新

■车文莹

撑,盲目投身其中,显然是不可取的。高校学生要真正实现科技创新,以下三点十分重要。

科技创新的思想来源于对生活细微的观察和积极的思考。这次参加创新大赛的项目,几乎都是来源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如在生活中碰到电源插头无法自由控制开关的问题,因此希望结合无线网络技术来加以解决。智能花草管家结合传感器技术,则有可能为爱花者解除后顾之忧。爱美的女生因为涂抹指甲油所碰到的气味难闻和有损健康的困惑,则有可能因为配方和用料的改进而展颜一笑。因此,创新离不开对于生活细心的体悟和观察,并非不可触摸。

科技创新的实现取决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复合的知识结构。创新大赛中学生暴露出将创新付诸实现的瓶颈——专业知识的不足。不少项目只是原理构想,专业知识的匮乏使得项目无法进一步推进。另外,大多数的项目不仅涉及某一专业领域,更需要跨专业的知识结构。因此,对于立意

创新活动的大学生来说,学好专业基础,拓宽知识面,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即便一生皓首穷经,也无法精通多学科的知识。因此,团队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一些大的科研项目,往往聚集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能人,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系统性的研发工作。

科技创新的推广依赖于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在大赛中,参赛者口头报告项目构想及实施过程,同时展示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大学生在综合能力方面的不足,比如逻辑思维不够清晰,重点不突出,口头表达能力不够等。而事实上,在科研创新的过程中,逻辑能力、表达能力、沟通合作能力等,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

大学生是最有活力的创新群体。学好专业基础,拓展知识面,培养综合素质,是高校学生创新的基石。同时,于平凡的生活中细心观察,展开想象的翅膀,创新之花才能在现实人生中灿然盛开。(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域外传真

该把读博变为一种职业吗

■汤姆·利弗莫尔 杰米·加拉赫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希望把博士生的学生身份改为雇员身份。而这引起了许多博士生的讨论,有人赞同,也有人表示反对。

反对者,伦敦大学学院博士汤姆·利弗莫尔:这对我的同龄人来说,最普遍的问题是他们的工资会发生什么变化。目前,我们的津贴是免税,我们维持着合理但不奢侈的生活水平,收入与其他毕业生的薪水水平相当。如果失去我们的学生身份,我们就失去了有效的减税方法,科研基金或许应该有相应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训练一个博士生的花费将变得更加昂贵,也就是说,同样的资金规模可支持的博士更少了。而这一切,在我看来,并非一个理想的结果。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和 Eurodoc(一个代表欧洲的博士生组织)都认为,如果把博士生作为一个员工看待,人们会更好地认识到博士生研究作出的贡献。也许我很幸运,但是我不觉得我的学生身份影响到了他人对我的表现的评价。我也不觉得,学生身份有阻碍我参加实验室、院系或者其他会议上的讨论。

除了这些更私人的问题,取消博士生的学生身份,会影响那些国际生源来到英国接受学术训练。目前,博士生的数字超过了净移民数字,那些来自非欧洲经济区(EEA)的学生有资格获得Tier 4学生签证。相比之下,如果博士生变成一种

职业,拿到英国的员工签证难度更大。但是,英国的科研其实得益于科研人员丰富的国际化背景,因此,如果博士生变成工作的话,势必损害到这种国际多样性,也将是英国科教界一种耻辱。

最后,我相信博士在经过科研训练之后可以在任何职业领域就业,包括但不限于学术界。如果把博士生都当作科研人员来进行训练,事实上会把一些不愿意走学术道路、希望投身于其他职业,例如工业的学生强制性推入学术界。如此看来,继续给博士生学生身份的好处远远大于给他们工作身份。把博士生变为雇员就得减少博士生名额,进行签证限制或使他们被迫走学术路,实际上没啥好处。

赞同者,格拉斯哥大学博士后杰米·加拉赫:读博看起来的确和一份工作很像,直到有些事情出现问题。你想想,你签了一份为期四年的工作,朝九晚五,有固定收益,但你没有任何法律权利——产假/陪产假、养老金甚至病假。但所有这些却都可能发生,这就是博士生的现状。

四年来,我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每天都在实验室里,我写论文、做实验,有一系列的义务和责任,只不过我没有“工作”,而是“学习”。这种区别意义重大。我每个月收入1150英

镑,相当于一个行政助理的收入,但是我不交税。换言之,因为我没有交税,我也没享受上面提到的病假等各种福利。

博士期间,我想租一间公寓,结果被告知他们不接受学生。当我想买个公寓,被告知我没有收入。如果我决定收养一个孩子,也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在大多数情况下,博士生的资助者在产假/陪产假等问题上,会把博士生视为员工对待,但这种“推荐”有一定余地,要拿到并不容易。

几年前,在帝国理工,一位育有婴儿的女博士生质询过当时的大学和科学部长大卫·威利茨,要求对处于此种情况(指有生产、哺育需求,编者注)的博士生提供一定的支持。然而,部长指出,博士生作为不纳税的群体,不能期望得到纳税者的所有权益。

有些人担心当博士变成职员后,读博的机会会被削减。这种看法的基础在于,由于税收会扣除一部分收入,研究委员会将不得不增加每个助学金的总额。其实,如果这真是一个问题,我们不妨这样想:如果这一切真的会发生的话,那么变为雇员后的博士所缴纳的税金,完全可以反过来再拨付给各个研究委员会。

既然博士生可以写论文,又和许多学术研究者一同工作,做数据,那么,人们应该从一份工作的角度承认他们的工作。(本报记者韩琨编译)

高教观点

近日,教育部出台《关于“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的部署和要求,审批设置2015年中东部地区本科学校,同时审批部分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教育部将组织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对申报设置的高等学校进行实地考察,将列入专家考察的36所中东部地区申报设置本科学校和9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名单向社会公示。

这次公示的名单中,有18所高校从学院更名为大学,有17所从专科学校升格或新设为本科院校。对于我国高校更名,舆论多持质疑态度——高校不把精力花是提高办学质量上却在“逐名逐利”,但是,质疑声并没有挡住高校更名的步伐。这背后的原因,需要从更名的操作上去探究。

按照目前的高校更名操作程序,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对申报更名高校组织的评议、考察,从本质上说,就是对高校进行的行政评价。而在目前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这种行政评价就代表了政府对学校办学的“认可”。进而,高校会把申请更名成功,作为最重要的办学政绩,这是高校乐于投入大量精力用于更名的重要原因。

虽然我国教育主管部门曾一再强调,高校要安于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定位上办出特色和一流水平。可是我国过去6年间,近500所高校的更名都是得到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换句话说,教育主管部门是高校频繁更名的重要推手。从我国对高校更名提出的要求,以及对不同高校的管理措施分析,教育主管部门甚至有把更名作为“激励”高校发展的意图。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把学院和大学按学科门类分开——该法规定,“大学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很显然,有的学校就会想方设法通过增加学科点(包括自建和合并),来实现建设“大学”的目标。而且,我国的大学也会把学科的多少,作为学校办学实力的重要指标——我国很多大学的宣传资料上都写着“学校学科齐全”。近年来,我国一些刚升格为本科的院校,就不断增设学科、专业,做大体量,这和政策导向不无关系。

高校更名,不仅仅有“名声”上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还有相应的政策优惠。高职高专升格为本科院校自不用说,按照目前的公办本科院校设置,一所公办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后,学校的行政级别将从副厅升为正厅;学校的招生也将从专科批次调整到本科批次。本科院校更名为大学,学校的行政级别将不会调整,但是,对于有“大学”身份的高校,政府部门在配置教育与学术资源时,包括配备师资、扩大招生、申请课题是有所优待的。在高校领导看来,更名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是目前还存在以身份区别管理高校的问题。

分析到这里,高校更名的逻辑就很清晰了:政策导向一行政评议一更名利益“三位一体”,教育部门通过把更名与利益挂钩,再对更名进行行政评议,这和此前推行的本科教学评估和重点学科评审,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得到的行政评议结果不同而已。本科评估的结果是优秀与否,重点学科评审的结果是列为重点学科与否,而更名评议的结果是更名成功与否,这每一项评议都由行政主导,都与利益相关,于是产生同样的问题:急功近利、弄虚作假。

另外,虽然我国2010年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早已明确,发展高等教育要从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和特色。但是,相关政府部门从来没有摆脱重视数量的思维,还把一个地区有多少本科院校,有多少“大学”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目标。因此,高校更名还和地方利益相关,也被地方政府作为重点工程。

要让高校不热衷更名,就必须取消对高等教育的行政评价,切实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管办评分离改革,来建立新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政府部门应该做的是依法保障对教育的投入,同时给每所高校一样的政策,不能把学校分门别类、差异化对待。把高校分类,搞出三六九等,再由政府来评议院校人哪一类,进入某一类,才能获得政策优惠,这怎么能引导每所高校在各自的定位上办出特色?高校必定会把更多时间用于去和政府打交道,并尽力按照分类标准去办学。只有政府部门退出高校的办学和评价,由学校自主办学,同时实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才能减少行政对学校办学的干预,让高校逐渐在办学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形成特色,而不是在追名逐利中干校一面。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高校更名的行政与利益逻辑

熊丙奇